

列宁全集

第十四卷附册

几点說明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中是編为第13卷，在第4版中是編为第14卷。第3版对本書的一些注釋较为詳細；另外还附有列宁在本書中所引用的書报杂志索引及人名索引。这些材料在第4版中被刪去了。我們觉得，这些材料对研究列宁的著作都有参考的价值。因此，就把它們譯了出来。但是，为了保持“列宁全集”中文版的規格的統一，我們沒有把这些材料編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而另印成附冊。

关于这些材料，还作以下交代：

1. 注釋方面：我們只选譯了較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这些注釋所注的地方，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4卷中大部分也有注釋。因此，我們即依照俄文版第14卷的原有注碼編排，沒有另編注碼。

2. 人名索引方面：有些人的生卒年月在原文中不全或有錯誤，我們根据最新材料作了补正。人名条目中的某些無關紧要的部分，已由譯者刪去。

3. 書报杂志索引方面：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曾引用了許多書报杂志。为了使讀者了解列宁所引証的原始資料的出处，我們把这些書目按照作者的姓氏笔画編譯成索引；另外并附有書报杂志的原文索引，讀者可以按外文字母的順序查閱。

目 录

“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注释选译·····	1
人名索引·····	21
列宁引用的书报杂志索引·····	71
书名索引·····	71
书报杂志索引·····	88
书报杂志的原文索引·····	92

“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注释选译^①

- 1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列宁在1908年夏天写的；第一次刊载于“列宁文集”第3卷第531—534页。1908年6月下旬（新历），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哲学修正主义的代表之一在日内瓦宣布举行哲学讲演会。根据“列宁文集”第3卷中许多同志所指出的，报告人是卢那察尔斯基。但根据主持国外情报工作的加尔亭格的情报，报告人是波格丹诺夫，这个情报是和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回忆录符合的。在这以前，列宁关于必须和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哲学观点公开划清界限的思想完全成熟，于是他就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当时列宁本人忙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准备工作，并拟赴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文献。因此，他就委托完全拥护列宁的立场的“无产者报”编辑委员和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的成员杜勃洛文斯基（印诺肯齐）去发言。

在波格丹诺夫的讲演会上，杜勃洛文斯基确实作了激烈的发言，当时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曾起来答辯。“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列宁给杜勃洛文斯基写的发言提纲。“十个问题”的原文是列宁亲笔写在四开纸上，杜勃洛文斯基在上面作了几个记号。

杜勃洛文斯基的发言标志着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正式划清界限。

文中提到的哲学体系之基本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点，是恩格斯在其著作“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的。休谟哲学是“不可知论”，这

① 本注释中的注码与“全集”第14卷正文注码相同，只有最后三条注释在正文中没有注码。——译者注

是恩格斯在他的“論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評定的。有关的两大段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中全部引用了，見“全集”第14卷第94—96、103—107頁。

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中还发展了关于“自在之物”轉化为“为我之物”的原理。列宁在“全集”第14卷第64、215—226頁談到馬赫对舒佩及其立場的态度。

彼得楚尔特对馬赫的門徒們（特別是科內利烏斯）的評論，見“全集”第14卷第229—230頁。

关于列宁反对馬赫主义的言論，見下注。

最后，至于談到列宁的也可以說是关于哲学問題的公开講演，那末，在1909年一年里，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保存的两个通告，曾有过两次：（1）1909年5月21日讲“宗教和工人政党”（显然，这个报告是“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見“全集”第15卷〕的基础）；（2）1909年11月26日讲“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論“路标”）。——（正文第1頁）

- 9 列宁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哲学的，我們知道得不确切。列宁早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第一編中，就已經卓越地批判了民粹派的思想首领米海洛夫斯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理論，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辯証法。从克魯普斯卡婭的1893年至1894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列宁在防止对馬克思学說作机械的刻板的理解这一点上已經做得出类拔萃。当时在彼得堡的馬克思主义小組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市場問題，在他的論述中“提得特別具体，把它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一切見解中都令人感觉到从現象的具体情况和發展来观察現象的活的馬克思主义。”（“論列宁”〔回忆录〕列宁研究院出版第1卷第5—6頁）显然，在这以前列宁彻底地研究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其中也包括哲学著作。經常可以看到列宁引証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和“反杜林論”。但是，根据我們現在所掌握的材料可以断定，列宁在稍后一个时期才专攻哲学。

列宁在对民粹主义观点进行同样的批判时，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后的另一著作“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評”（“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11—481頁）中，也談到了几个哲学問題。在第2章“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中，列宁出色地确定了社会科学中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区别，反对了司徒卢威的下述論点：“我們不能不承认，这个学說（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純粹哲学的論証。”（着重号是列宁加的）列宁指出，司徒卢威所說的馬克思主义的“純粹哲学的論証”指什么，是令人莫解的，因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即离开其他科学而孤立存在的权利。正像后来所表明的，司徒卢威的意見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条道路就是先替馬克思主义和資產階級哲学的結合提供“論証”，而后完全公开地否认馬克思主义。

最后，在这一时期列宁的一篇論恩格斯的文章中，我們发现了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指示，这篇文章刊登在“工作者”杂志1896年第1、2两期上（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12頁）。这篇文章写于1895年秋，它專門叙述了黑格尔的学說对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思想发展的意义以及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

90年代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开始认真地研究哲学問題。

克魯普斯卡婭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晚上讀哲学著作——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伊里奇在吉斯遇到林格尼克的时候和他談論康德（前引回忆录第25、27頁）。列宁之所以在这个时期研究哲学，这首先取决于哲学爭論和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礎問題在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出現之初所占的地位。大家知道，伯恩施坦的基本理論原理之一，就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方法当作黑格尔經院哲学的殘余加以否定。伯恩施坦、他的哲学导师康拉德·施米特以及俄国修正主义者，首先是“合法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修正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力图在哲学領域中把他們

曲解了的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和經濟理論同康德主义联結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必須起来保卫馬克思主义，并且在这方面把自己武装起来。列宁在1898年9月2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指出了H. Г.（即日特洛夫斯基）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1898年第6、7两期）上的反对唯物主义和辯証邏輯的言論，并且写道：“我很奇怪，为什么《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唯物主义史論丛”）的作者〔普列汉諾夫〕过去既不在俄国著作中反对新康德主义，而現在又不坚决反对它，却让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去爭論这种哲学的枝节問題，似乎这种哲学已成为俄国学生〔即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一部分了”。列宁在俄国最先完全不受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約束而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系統地叙述和发展了辯証唯物主义。

当时普列汉諾夫也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了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的康德主义和客观主义。但是，列宁的批判無論就深度或政治上的尖銳程度來說，都大大地超过普列汉諾夫的那种学院主义的抽象的批判。列宁甚至在自己最早期的著作中彻底發揮了理論的党性，特别是哲学的党性問題。

列宁在1899年4月27日的信中又指出，他覺得馬克思主义中的那股“新的批判風气”，即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述恋的那股批判風气，“极为可疑”（“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18頁）。最后，列宁在1899年6月27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写道：“对于俄国学生們的那些‘惊人发现’以及他們的新康德主义，我愈来愈感到憤怒……我非常滿意地一再閱讀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讀了这位作者发表在《Neue Zeit》（“新时代”。——譯者注）上的那些反对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文章（1898—1899年“新时代”第5期，以后各期沒有見到），讀了我們的康德主义者（彼·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稱贊的 Stammler（《Wirtschaft und Recht》）（什塔姆列尔〔“經濟和法”〕。——譯者注），我坚决站在一元論者这边。什塔姆列尔特別使我憤怒，在他那里我根本看不到絲毫新穎的有內容的东西…… 十足的 erkenntnisstheoretische Scholastik！

(認識論上的經院哲学！——譯者注)这是最平庸的最坏的法学家的拙劣的‘定义’以及由此得出的同样拙劣的‘結論’。在讀了什塔姆列尔的著作以后，我讀了‘新語’杂志上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的文章，发现的确須要認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我已經忍不住了，所以对新康德主义发表了意見，进行了抨击，以此回击司徒卢威（针对他发表在“科学評論”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和回击布尔加柯夫。我說‘忍不住了’，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多学习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題目写文章。現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維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轉到康德。”（“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24—26頁）

的确，1899年列宁在“再論实现論問題”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这两篇文章中，对康德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列宁在一个地方給第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注釋：“順便談一談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判’。当然，任何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反对一般的批判。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一个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可能在这里談論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內容的問題，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見。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沒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証明这种轉变的必要性，也沒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由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馬克思的理論，因而使馬克思的理論得到好处。他們甚至沒有完成首先落在他們肩上的任务，即詳細地分析和駁斥恩格斯对新康德主义的否定的評價。相反地，那些沒有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辯証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辯証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闡述，指出了辯証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对我來說，只援引別尔托夫先生的著名的俄文著作（指普列汉諾夫的“論一元史觀的发展問題”。——譯者注）和德文著作《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Stuttgart, 1896）就够了。”（“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65頁）

列宁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这篇反对布尔加柯夫的文章中，在提到布尔加柯夫所谓他的世界观和考茨基的世界观相同的说法时指出：“讲到哲学世界观，我们不知道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话对不对。考茨基似乎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的批判哲学的拥护者。”（“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36页）

最后，在上面引证过的1899年6月27日致波特列索夫的那封信中，列宁谈到刊载在“开端”杂志第5期上的一篇评论波格丹诺夫的著作“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版）的匿名文章。因为评论者对这本书作了否定的批评，说它和康德主义背道而驰，列宁非常注意这本书，怀疑它的作者（以及在它以前出版的“经济科学简明教程”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对于这本书发生兴趣，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倾向。显然，当时列宁为了和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主义”作斗争，想把自己彻底武装起来。必须指出，实际上波格丹诺夫的这部著作，正像列宁在后来知道了它的内容以后所指出的，的确是接近唯物主义的，尽管它没有摆脱在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哲学的影响下所犯的错误。

在1898年至1899年这一时期还有列宁和林格尼克关于哲学问题的通信。可惜，由于林格尼克在西伯利亚流放期满之后过着流浪的生活，这些书信被遗失了。不过，根据他的回忆，列宁在这些信内分析批判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194—195页）。勒柏辛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变迁”）中补充说，列宁致林格尼克的信有时候是完整的长篇哲学论文。

最后，在这一时期写的还有：（一）列宁在1899年末写的一篇对考茨基的著作“反伯恩斯坦论”的评论，这篇评论载于“列宁文集”第7卷，列宁在这里满意地指出考茨基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二）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中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59—581页），这篇文章是列宁为了回答斯克沃尔佐夫对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批评而写的。

这就是列宁从事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反对披着康德主义外衣的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

紧密地联系着的。

列宁从事哲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发生的哲学动摇的第二阶段联系着的。这一阶段的哲学动摇开始于1903年至1904年，而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哲学修正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波格丹诺夫。在第一阶段，修正主义的思想鼓舞者是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一口号的新康德主义，而在第二阶段，哲学修正主义首先是和馬赫、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义哲学結合在一起的。

列宁在1908年2月25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叙述了他和波格丹诺夫的关系：

“自从我在西伯利亚仔細研究了波格丹诺夫的唯能論著作‘自然史观’以后，我就注意他的哲学著作了。对波格丹诺夫來說，这种观点只是他向其他哲学观点的过渡。我同他認識是在1904年，当时我們就立刻互相贈送了自己的著作；我送他一本‘进一步，退两步’，他送我一本他当时写的哲学著作。我并且很快（1904年春天或夏初）就从日内瓦写信到巴黎告訴他：他的著作使我更不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更相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們曾几次談到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向我解釋波格丹诺夫观点的錯誤，但他认为这种偏差决沒有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清楚地記得，1903年夏天我和普列汉诺夫以‘曙光’杂志編輯部的名义同‘实在論世界觀論丛’編輯部的代表在日内瓦談过話，双方同意合作，我負責談土地問題，普列汉诺夫負責在哲学上批判馬赫。普列汉诺夫提出把批判馬赫作为合作的條件，‘論丛’編輯部的代表完全接受了这个条件。当时普列汉诺夫把波格丹诺夫看作是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然而是一个由于追隨奧斯特瓦尔德和馬赫而犯了錯誤的同盟者。

“1904年夏天和秋天我們同波格丹诺夫等几个布尔什維克的意見完全一致，我們訂立了默契，大家不談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它使我們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

贯彻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我深信不疑地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25—426页）

这个联盟决不是意味着不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錯誤。相反地，我們知道，还在“經驗一元論”第1卷（1904年波格丹诺夫将此书贈送給列宁）出版之前的一年半至二年期間，列宁曾專門要求普列汉诺夫，后来又要求阿克雪里罗得（即奥尔托多克斯，她在“曙光”杂志上写过哲学方面的文章）去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錯誤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资产阶级“批判”意向的新变种（参看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1904年写的文章“修正主义的新变种”，載于“哲学概論”1906年版第171頁。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261、269、271、273頁）。所以，当后来普列汉诺夫为了狹隘的宗派目的而責难布尔什维克是馬赫主义者的时候，列宁有充分根据去援引自己不止一次地发表过的反对波格丹诺夫最初背棄唯物主义的那些言論。在“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1905年9月，載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361頁）一文的綱要中，有“吹毛求疵的指摘”一項，其中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无中生有地指摘布尔什维克对哲学不关心，并且用上述奥尔托多克斯的申述来反对他。但是，那时候哲学問題还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我們发现列宁只是在“怎么办？”（在“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那一节）和“进一步，退两步”中順便提到过哲学的作用。在“进一步，退两步”的“稍微談談辯証法”那一节中，列宁指出，不仅燕麦苗是“按黑格尔的規律”，即按否定的否定規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間的斗争也是“按黑格尔的規律”进行的。

革命以后，哲学問題重新被提到重要地位。列宁在“我們的取消派”（发表在“思想”杂志1911年第2、3两期上）一文中，概括地描述了1908—1910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哲学爭論，而且特別說明了哲学爭論和馬克思主义的命运之間的“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列宁指出：“（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錯誤的、危險的、反动的，对这些問題的爭論总是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別’有‘真正的现实的联

系’，不然这个派別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就不是社會政治的，也不成其為派別了。只有主張改良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那些鼠目寸光的‘現實的政治家’才會否認這種聯繫的‘現實性’。(2)既然馬克思主義具有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那末在俄國也和在其他國家一樣，不同的歷史時期使馬克思主義的某一方面更加突出，就沒有什麼奇怪了。在德國，在1848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特別突出，在1848年，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特別突出，在50年代和60年代，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特別突出。在俄國，在革命以前，特別突出的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我國實際中的運用，在革命時期，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在革命以後，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並不是說，有時可以忽視馬克思主義的某一方面；這只是說，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決於主觀願望，而取決於一切歷史條件。(3)社會政治反動時期，‘消化’豐富的革命教訓的時期，對於每個生氣蓬勃的派別說來，是把包括哲學問題在內的基本理論問題放在一個首要地位的時期，並不是偶然的。(4)在俄國先進的思想流派中，沒有像法國那種同18世紀的百科全書派有聯繫的或者德國那種同從康德到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有聯繫的偉大的哲學傳統。因此，正是對俄國的先進階級來說，這種哲學‘整頓’是不可缺少的，至於這種‘整頓’姍姍來遲，在這個先進階級完全成熟到在最近的偉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獨立的历史作用以後才開始進行，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5)世界其他國家早就準備好進行這種哲學‘整頓’，因為例如新物理學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有待辯證唯物主義去‘處理’。在這方面，‘我們的’（波特列索夫的說法）哲學爭論就不只具有一定的即俄國的意义。歐洲已為‘更新’哲學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後的俄國在1908—1910年這個被迫沉寂的時期，特別‘渴望’求助於這種材料……”

所以，列寧繼續寫道：“我們的一切反動派，特別是自由派的（路標派的、立憲民主黨的）反動派，‘求助於’宗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馬赫主義這個變相的唯心主義客觀上就是反動派的武器，反動派的宣傳工具。因此，在1908—1910年這個歷史時期，在我們看到‘上面’不僅有十月黨人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拜神杜馬’，而且還有

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时期，‘下面’反对馬赫主义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卷第58—60页）

在上面引用过的那封致高尔基的信中，紧跟着我们引证的那段关于1905年革命前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的相互关系的叙述之后，列宁写道：“在革命火热的时候很少研究哲学。1906年初波格丹诺夫在狱中又写了一部著作，大概是‘经验一元论’第3卷。1906年夏天他送了一本给我，我便坐下来仔细阅读它。我读完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极端错误的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那时就向他‘表白爱情’，给他写了一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我在信中明白地告诉他：在哲学方面我当然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他那些明白易懂、写得很出色的著作使我完全相信他根本错了，而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这些笔记本我曾给某些朋友（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看过，本来想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这个标题发表出来，但是没有实现。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立即把它发表。前几天我写信到彼得堡请求把这些笔记本找出来寄给我。

“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已经出版。除了苏沃洛夫的那篇文章（我正在看）之外，其余的我都看了，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劝读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札罗夫），他们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札罗夫和波格丹诺夫），他们宣传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教给工人‘宗教无神论’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那察尔斯基），宣布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为神秘主义（别尔曼），从法国某些‘实证论者’（主张‘符号认识论’的该死的不可知论者或形而上学者）的臭水沟里汲取东西（尤什凯维奇）！不，这太不像话了。”（“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26—429页）

列宁的那几本称为“表白爱情”的笔记本，我们也没有找到。不过，其中的观点显然是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发

揮的那些思想的雛形。

1907 年到 1908 年，哲學問題上的鬥爭愈來愈尖銳。當時，波格丹諾夫是布爾什維克領導核心的成員和“無產者報”編輯部的委員。列寧的任務首先是和波格丹諾夫的哲學觀點劃清界限；正如列寧在 1908 年 3 月 24 日致高爾基的信中所寫的，“把這一切爭論和派別分開”（“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84 卷第 396 頁），這樣讀者就沒有理由像普列漢諾夫從他的孟什維克派的觀點出發所作的那樣，把布爾什維主義和波格丹諾夫的馬赫主義聯在一起。但是，列寧認為布爾什維克內部在哲學問題上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自己在鬥爭的第一階段上的任務只在於：不使鬥爭引起布爾什維克派分裂。所以，當《Neue Zeit》（“新時代”雜誌 1908 年第 20 期 2 月 14 日出版）上發表了波格丹諾夫的“馬赫和革命”一文的譯文和譯者序（其中談到，普列漢諾夫和波格丹諾夫的意見分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有可能成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派的意見分歧）的時候，“無產者報”編輯部根據列寧的堅決要求發表了評論文章。文章中指出，兩種哲學思潮的擁護者在兩個派別中都有，因此，任何想把這些意見分歧說成是兩個派別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企圖，都是根本錯誤的（“無產者報”1909 年 2 月 26 日第 21 號）。在“新時代”雜誌 1908 年 3 月 20 日第 25 期第 898 頁上也發表了一篇相應的文章，題為“馬赫在俄國”。

當時鬥爭展開了。列寧雖然暫時主張布爾什維克派在這一鬥爭中保持“中立”，但列寧自己完全不打算保持中立。恰恰相反。布爾什維克派（包括“無產者報”）保持“中立”，在特殊的刊物上，而不在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刊物上進行哲學鬥爭，就是為了防止布爾什維克派在政治上無根據的分裂，並且首先證明布爾什維主義和馬赫主義沒有任何聯繫。高爾基曾認為，如果布爾什維克內部在哲學上進行爭論，孟什維克就會從中漁利。列寧在 1908 年 3 月 24 日的信中对高爾基的這種看法提出批評說：相反地，如果布爾什維克派不把自己跟三個布爾什維克（波格丹諾夫、巴札羅夫、盧那察爾斯基）的哲學分清界限，孟什維克才會從中漁利。列寧寫道：如果不這樣做，那末孟什維克就會徹底獲得勝利。

“如果哲学爭論在派別之外进行，那末孟什維克就会被完全牽到政治上來，在这里他們只有死路一條。”（“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7頁）

哲学上的意見分歧所引起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同一封信中这样向高尔基指出：“当然，您必須明了，也应当明了：一个党员一旦認識到某种学說是极端錯誤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說。如果我不是絕對相信（我愈是閱讀巴札罗夫、波格丹諾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們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謬、有害、庸俗、說教的作品，我也不会來爭論的。普列汉諾夫反对他們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懶于具体地、細致地、簡明地說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我無論如何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說出自己的反对意見。

“亲爱的阿·馬·，这里有什么‘和解’可言呢？別那么想了，提和解是可笑的。斗争絕對不可避免。党员不应力图掩盖、拖延或迴避斗争，而应当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損害。您应当关心这个問題，十分之九的俄国布尔什維克会在这方面帮助您，并对您表示深深的感謝。

“应当怎样做呢？‘中立’么？不，在这样的問題上不可能有中立，也不会有中立。如果可以談中立，那也只是指这样一种特定的意思，即必須把这一切爭論和派別分开。”（“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5—396頁）

可見，列宁的計策是很清楚的：把布尔什維克派和三个布尔什維克-馬赫主义者的哲学分清界限，这样就可以騰出手來同孟什維克进行政治斗争，可以避免布尔什維克派的分裂，可以在哲学上和哲学修正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由于修正主义者在西欧得到支持，因而列宁的处境更加困难。列宁在1908年2月13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証明，考茨基主办的最穩健高明的馬克思主义刊物“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而在最近竟无条件地刊登了經驗批判主义

者的文章”(“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2页)。哲学唯物主义在西欧处处遭到蔑视。两个派别中有一股巨大的写作力量站在马赫主义者那边,此外紧靠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他们来“推翻”唯物主义的是切尔诺夫。十分广泛的反唯物主义的统一战线形成了。因此列宁更坚决地起来捍卫唯物主义。

斗争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1908年4月)中抱怨地说:“我现在整天阅读该死的马赫主义者的文章,而给报纸的文章却写得非常仓促。”(“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8页)但是,这个斗争是必要的,列宁非常慎重地准备了这个斗争。

列宁在为“卡尔·马克思”文集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中开始了战斗。“卡尔·马克思”文集是一群布尔什维克编辑的,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给自己的文章加上了这样一个注释:“见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这里不是分析这本书的地方,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

列宁还在正文中写道:“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囔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囔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們,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

是对现代国家而言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而言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卷第15—16页）

因此，列宁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在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实际的功绩。然而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批判还不够，指出必须更彻底地批判马赫主义，揭露它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列宁在发表这种言论的同时，继续写一本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为了对这本著作进行最后的加工，列宁特地到伦敦，在这里 he 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藏书。1908年秋，著作完成了，1909年春出版。

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之间除了在哲学领域中有意见分歧，他们之间的政治性质的意见分歧也尖锐化了。大多数马赫主义者和造神派（以卢那察尔斯基为首）拥护“抵制主义”、“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召回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1909年初，“无产者报”开始公开地和马赫主义哲学斗争，在1909年2月25日（旧历12日）第42号上刊登了加米涅夫的一篇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题为“路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了卢那察尔斯基企图通过造神说的宣传“使社会主义具有更适合于非无产者阶层的形式”。加米涅夫在文章中宣称：“适应半农民的宗教心理并以为这样可以促进‘革命的合作’的那种社会主义，和那种‘不去惊动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价值相等的东西。”

波格丹诺夫支持卢那察尔斯基，他对于刊登这篇文章发表了正式的抗议。结果“无产者报”编辑部发生了激烈的组织上的冲突，后来，彻